

“五四”自由婚恋悲剧新说

彭 芑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指引下, 青年男女们沉默压抑长久的心灵猛然苏醒, 他们开始高呼“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为了自由爱情同封建礼教勇敢地抗争。然而当“五四”退潮后, 却出现了一些即使奋斗胜利、有情人牵手成功最后却依旧以悲剧结尾的小说。究其缘由, 一方面, “五四”男女们自身存在着新旧思想的冲突和与各自性别有关的失误; 另一方面, 发展滞后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的局限性也注定了“五四”自由婚恋的悲剧结局。

关键词: 五四婚恋; 二次思考; “中国式”娜拉; “夫之门”

中图分类号: I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6-0083-06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恋爱自主、婚姻自由是衡量社会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传统包办式的婚姻, “五四”先驱们奋力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 大声疾呼着人性解放, 然而在勇敢前行的路上却遇到种种阻碍使爱情过早夭折。即就是冲破重围、奋斗胜利后, 长相厮守的生活也与当初所思甚远,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落差使得青年们纷纷陷入迷惘无措中, 以鲁迅的《伤逝》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深刻反应了“五四”青年们自由婚恋的悲剧, 揭开了“五四”时期有关婚恋自由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五四”时期西方有关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大量涌入中国, 如一记重锤猛烈冲击着国民思想和传统的家庭人伦观,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封建婚姻制度作为陈旧社会的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了革新的对象。其时中国舆论界频频发声, 有关婚恋自由的讨论遍布各大报刊, 《新青年》《解放与改造》《妇女评论》等刊物上都出现了大批反对包办婚姻、高呼恋爱自主的文章。李大钊在《不自由之悲剧》中谈到社会问题时说: “今日社会的缺陷……其最要且甚者, 尤为婚姻制度。”^{[1]668} 胡适在《论贞操问题》一文中明

确表示: “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 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 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2] 鲁迅先生更是直接称包办婚姻为“无爱情结婚的恶果”。而由陈望道主编的《妇女评论》中后来甚至直接推出了“自由离婚号”。从旧式婚姻的弊病到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再到新式婚恋的大力提倡, “五四”先驱们以极高的热情参与进这场新旧之辩中。

然而当这种对于婚姻爱情的美好理想落入现实时, 二者却产生了巨大的冲撞。在以“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3] 的五四小说中, 我们看到的是与理想差之甚远的现实: “五四”热血青年们在勇敢前行的路上遇到种种阻碍挫折使得爱情过早夭折, 他们有的败给了现实, 有的妥协了父母, 有的宁肯选择牺牲也不放弃对真爱的追寻。罗家伦的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中, 知识分子程书平没有抵抗住家庭压力和恋人分手, 与一个被封建礼教彻底洗脑的女子无奈结婚, 在求自由而不得的苦痛中终日无奈忍受。王统照小说《遗音》里, 青年教师与女学生相爱却最终向母亲妥协, 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走入了另一段悲剧的包办婚姻中。而冯沅君《隔绝》里女主人公“生命可以牺牲, 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 不得自由我宁死”的爱情宣言, 更是对现实最有力却又最无奈的反抗。可以说, 在五四婚恋小说

创作的前半段,反映爱情美好但现实却求之难得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尽管现实艰难,但爱情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是一切幸福与甜蜜的起点。

然而随着“五四”热潮的消退,青年男女们发现即就是冲破重围、奋斗胜利后,长相厮守的生活也与当初所想相差甚远,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落差使得青年男女们纷纷陷入迷茫无措中,残酷的现实横亘在他们眼前,有关爱与自由的理想再次被现实予重击。以鲁迅《伤逝》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深刻反映了与前期高呼“爱即一切”所不同的主题。一些作家开始冷静下来,对于前期着力标榜的自由婚恋观念进行二次思考,在客观地审视社会出现的问题后,他们开始描写恋人们“胜利”以后的生活,当青年男女们排除千难万阻后最终走到了一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写于1925年10月的《伤逝》就是反映“胜利”以后青年男女们的生活状况的经典篇目,鲁迅在那样一个“爱是一切幸福终点”的年代里写出即使相爱成功最终也以悲剧收梢的故事,一定是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出现了某种偏差,而这种偏差是他们所不曾预料的,也是之前那些鼓舞人心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写的。涓生的手记是他为自己和子君的忏悔,更是理想爱情在与现实碰撞时的不堪一击,所谓“自至纯的心中涌出的敬爱”^{[4]372}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消磨而伤逝了。鲁迅借由《伤逝》表达了自己对于先前高呼的神圣化爱情的思考,个性解放、婚恋自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婚恋问题。

除了鲁迅对于现状的深刻反思外,庐隐同写于1925年的《胜利以后》也体现了她在“五四”男女奋斗成功后走入婚姻这一问题上的关注。与《伤逝》不同的是,这是一篇完全以女性视角来叙述的小说,一封密友间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当初拥有美好理想、勇敢逐爱的几个少女在“胜利”以后的生活以及她们复杂而又无奈的心情。庐隐看到了“胜利”以后“五四”儿女尤其是女儿们所处的一种惶惑和不甘的生存态势,借由主人公之口写下了自己对沉郁现实的思索和时代的疑问。

如果说,《伤逝》和《胜利以后》是作家对于现实的敏感把握和一种在停顿处的二次思考,张

爱玲创作于1957年的《五四遗事》则是在远离了那段燃情岁月后对于五四爱情神话的全面颠覆和反叛。小说中,罗与密斯范在新式思想和旧式婚姻的浪潮翻涌中几次分合,奋斗了将近十二年,罗终于离婚成功与密斯范结婚,然而在婚后的不合与争吵下,最终罗又接回了他的前两任妻子,四人一起住在“湖边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这个啼笑皆非的结局无疑是对“五四”文化启蒙最辛辣的讽刺,一切仿佛转了一个圈又倒退回原点,张爱玲在“五四”过后的三十多年写下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站在正统与经典外漫不经心地将美好的理想一一拆解,用她一贯尖刻精准的语言去叙述时代大潮下的真实。

无论是鲁迅、庐隐还是张爱玲,他们都看到了“五四”盛世之后青年婚恋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胜利”以后便琴瑟和鸣、四海升平,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青年男女深沉的迷惘和寸步难行的现实这让我们不由深思这些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二、坚定而迷惘的“五四”青年

在抗击封建旧制的路途中,青年男女们同仇敌忾的一致性使得他们暂时忽略了彼此不同的斗争动机,然而当他们终于“胜利”、携手共同生活时,之前刻意忽略的“内部差异”问题就逐渐变得难以弥合起来。

1. 外新内旧的矛盾

谈及“五四”,谈及新文化运动,最常提及的便是西方先进思想,学习西方、反对传统在那个时代似乎成为了一种标志和潮流。知识青年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诺拉》、雪莱、泰戈尔,大肆批判着一切与潮流不符的传统礼教,争先用民主和科学来武装自己,他们的言行举止俨然是与过去决裂的新人类。然而在“五四”退潮后的爱情悲剧小说中,我们却看到了很多老旧的、当初为“新人类”所鄙夷的东西随着时间流逝在慢慢复苏,显然,当时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思想中存在着“外新内旧”的矛盾。

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况,“郭与罗都是结了婚的人——这是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个

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5]268} 他们与密斯周和密斯范“发乎情止乎礼”的交往是小心翼翼又暗自欢喜的，游湖、吃饭、月下诵诗，以朋友的名义感受着新式交往的浪漫，其中暗自涌动的微妙情愫让两人快乐不已。这似乎是中国传统男性在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后的初步试探，当爱的波澜在心中越转越大时，罗最终下定决心和妻子离婚，并生出“献身于一种奋斗”的崇高感。行进至这里，罗的形象都是一个有着先进思想的五四新人，然而当听说密斯范与他人订婚后罗的反应就颇值得玩味了，他在离婚后立刻娶了根本不了解的以美貌闻名的王家女儿。一个为争取恋爱自由而坚定离婚的人却因为维护自尊的需要，重又走回了封建婚姻中。罗的思想本质依然是传统的，所以当他与范婚后有人提议将之前的太太接回来，他“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也就不奇怪了。表面上看，罗似乎是并没有做错什么，从旧式一夫一妻到自由恋爱、勇敢离婚，再回到一夫多妻的生活，他只是顺应事态发展而已，可实际上，他的所有选择都充分说明了他的“新思想”，只是短暂顺应潮流的一点皮毛罢了。至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密斯范最终却变成“范家的”，哭闹过后和和气气地帮着丈夫迎回前任太太，然后满腹牢骚与抱怨地过着日子，全然不复曾经的浪漫新潮。

可以说，“五四”男女们在接受新式文化冲击的同时都不同程度的遗留旧有的观念习惯，这些旧思想的阴影在他们为爱奋斗取得胜利后变得越来越大，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是“五四”自由婚恋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启蒙者”的局限

“五四”时期，有关“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一系列概念最初都是由男性提出的，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胡适的《贞操问题》等，都是自男性出发对于女性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现状的关注。男性大师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旧之争中不自主地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解放女性，为女性代言。然而启蒙者们种种为女性发声的行径更多的是为呼唤女性面对强大的敌人一同作战，所谓的平等与解放的概念也并不完全从两性角度出发，而是攻击封建礼教找出的有力论点。“启蒙者”们或许

并未意识到，这场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平等的偏差，男女并肩但并不平等，“社会秩序的话语权仍掌握在男性手中”^{[6]3}，因此，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自由婚恋也势必会产生问题。

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男性对女性的双重要求。一方面，他们希望女性在自己的启蒙和改造下是一个新的时代女性，她们不仅是自己的爱情伴侣还是自己在事业上的知己和伙伴；另一潜在的方面，在组建后的家庭中，他们还希冀她能具备中国传统式妻子的“优良品德”。如《伤逝》中，当子君在勇敢地做出自己的爱情宣言后，涓生的反应是“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7]112}。涓生显然是以一个拯救者的心态来看待子君这个自己成功的“教育成果”的，他骄傲且自豪地认为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将子君从一个旧式的沉默女性改造成了可以一起并肩前行的朋友和爱人。然而同居后终日忙碌于家务的子君渐渐无法符合涓生有关精神同伴的需求，“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7]119}。当涓生失了工作在家译书时，他对子君则更是不满，“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7]118}。表面上是在抱怨子君的性格变化和家中窘迫的生活现状，实质上则是恼怒自己在努力赚钱养家但子君却连家务也做不好，使得自己没有了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从先前的勉力宽慰到现在直接的怨怼，涓生实际代表了“五四”时期的一批男性，他们新的家庭生活中仍掌握着主导权和操控权，女性仍然处于一种“被要求”、“被评判”的状态。

“启蒙者”们的另一局限体现在他们走进婚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在中国旧式的家庭中，男性是家庭的主导，作为传统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他的地位以及权利是远远高于妻子的，相应的，他所肩负的使命也就更加沉重。在传统社会中，男性这种与生俱来、溶于骨血的责任承担是非常明确的——他必须敬父孝母、养护妻儿，成为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支柱。这也是为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男性大师们虽然高呼“人性解放、

婚恋自由”，但自己却裹足不前重要原因。

然而“五四”的到来打破了一切既定规则，这就使得走出旧家庭迈向新的恋爱关系的“启蒙者”们在家庭责任承担上开始出现迷失。没有了婚姻的约束，没有了宗法、家族的压力，当实际生活与美好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们时常不由地选择了逃避推卸。《伤逝》中当子君和涓生感情出现问题后，涓生就选择去图书馆逃避，并认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将困顿现实的原因全部推卸在子君身上，并不断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甚至想用了子君的死来了结一切。“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7]123}，这段心理描写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可见，在涓生的潜意识里他为子君设计了一个最坏的结局，以此来逃避现实。

“五四”的男性闯将们虽是先进的“启蒙者”，但他们自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他们依旧在家庭中掌握着话语权，对女性的双重要求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另一方面，在新式的家庭生活中缺乏责任意识，面对艰难现实选择逃避和推卸。这些都是五四自由婚恋悲剧的重要原因。

3. 中国式娜拉的失误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在父权和夫权的压迫下长期处于一种服从与依附的状态，依循“三从四德”来完成自己病态的社会角色。随着西方的思想的涌入和男性的大力启蒙，她们开始纷纷效仿娜拉勇敢出走，离开旧式家庭的压迫去寻找自己的幸福。然而此时大批走出家庭的娜拉们都是“中国式”的，她们出走的动机和对现实的认知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完全不同的。娜拉的名言是“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而“中国式”娜拉们的出走却并非自我觉醒后的决意离开，这样根本性的差别就导致这种“被鼓舞”的出走也就只能沦为一种“时髦的姿态、浪漫的实验”^[8]罢了。因此，随着“五四”大潮的褪去，这种看似成功的模仿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五四”女性的反抗意识实际是被男性用“恋爱自主、婚姻自由”的呼喊所唤醒的，于她们而言，这实际上是一次“为爱出走”，这就造成了娜拉们的第一个失误——过分关注于浪漫爱情而忽略其他因素，一切有关“平等”、“自由”的概念

是在爱情的大主题下完成的，其奋斗动机较之男性要更加单纯和狭窄。比如子君、比如密斯范都是典型例子，《五四遗事》中写“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5]274}。在密斯范这里，先进的思想变是她讨好和迎合男性的工具，他并不需要完全理解罗口中的那些新思想，只是以婚姻作为终点来奋斗，至于奋斗成功后该怎么样，许多像密斯范一样的年轻女性并没有想过。所以庐隐的《何处是归程》会写：“女孩子的心，完全迷惑于理想的花园里……结婚的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9]139}

“中国式”娜拉们的第二个失误是婚后不成长。一路走来，“五四”女儿们的成长本来就很脆弱，对新思想的有限接受、自身的新旧矛盾和婚后家事的繁重琐碎，那一点曾经同男性一起作战的勇气就变得更难坚持。《伤逝》中子君虽做出“我是我自己的”这样的勇敢宣言，但和涓生同居后，在琐碎的家庭事务和窘迫的经济环境下，子君放弃了继续的学习与成长，停住了前进的脚步，她所有的勇气都被生活消磨干净，不再看书，更不会同涓生做些有内容的交谈，他们之间也没有了从前“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在涓生的眼里，子君已经由一个时代新女性变成只会捶着他人衣角过活的愚昧妇人，成为了自己的负累。子君同涓生间的不再同步的精神世界也是加速他们感情灭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式”娜拉们的第三个失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即从“父之门”走入“夫之门”这样一个新的禁锢中。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对自己的丈夫、对整个男权主义文化进行反叛，而如子君一样的“中国式”娜拉们则是对父权倾轧和礼教旧制的反抗，且反抗的缘由是被男性启蒙者们创造的爱情神话所吸引。这就导致了“五四”的女性们实际是“以娜拉的起点作为自己的归宿——离弃父亲的家庭而皈依丈夫”^[10]。在新的家庭中，女性与之前的生活状态并无大的差别，她们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一旦伴侣放弃对她的启蒙后她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自我救赎，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式的娜拉们自始至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所以她们的不幸也是铸定的。

总之，中国女性们在“五四”的时代洪流中与男性共同奋起反抗，但由于自身的思想和眼界的限制，她们在“五四”的自由婚恋悲剧中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破而未立的时代

在探讨五四自由婚恋悲剧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略——时代。只有将“五四儿女”们的故事放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阅读，才能真正地走入他们的世界，也才能真正理解那段激情岁月下的爱恨别离。

翻看“五四”前期知识分子们所做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其中涉及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从传统积弊的论述到当下该如何革新，胡适、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十分明确的叙述。如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就提到男女共同教育、婚姻制度的改革、女子的经济独立以及共同拥有普选权等一系列中国女子解放的条件。然而在如此之多和如此全面的理论指引下，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究其缘由，其时中国的这些先进言论都是对于西方理论的直接嫁接。而这种“借来的”理论是很难适用于中国当时滞后发展的社会的。

首先，五四时期的社会经济水平低下，整个国家国力衰弱，温饱问题仍是是国民的重要困扰。在生计艰难的严峻环境里，知识分子们的理想与信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贫困的阴影下的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经济窘迫对“五四”知识青年们的影响的在鲁迅的小说中尤为明显，《伤逝》中爱情败给了现实的涓生与子君、《孤独者》中为生计放弃信仰与坚持的魏连殳、《幸福的生活》中与“幸福的家庭”完全相反的世俗生活，“五四”青年们缤纷斑斓的理想在苍白的现实下显得愈发无力和脆弱。

其次，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给女性工作提供宽松的环境，在整个社会经济条件低下的情况下，女性外出工作的条件和机会较之男性要艰难得多。《胜利以后》中沁芝的几句话完全可以说明当时的背景：“女子入了家庭，对于社会事业，固然有多少阻碍，然而不是绝对没有顾及社会事业的可能，现在我们愁的，却不是家庭放不开，而是社会没有事业可做。”^[11]¹³⁰由此可见，此时的社会还未发

展至男女可以共同外出工作的阶段，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们并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大量受教育的如沁芝一样的新时代女性们并没有走向社会开始就业，出于家庭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原因，她们只能困顿家中。

最后，“五四”时期传统社会的舆论评判依然深深困扰着青年男女们，男女不平等的世俗眼光此时还牢牢钳制着大众的头脑，一旦爱情灭顶，已出走的中国娜拉们很难在世俗眼光下继续生活。

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女性狭窄的工作机遇，再加上传统世俗的偏见眼光，“五四”退潮后味同嚼蜡的家庭生活让青年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胜利以后》中沁芝在感慨，“中国的家庭，实在足以消磨人们的志气”^[11]¹³¹，《何处是归程》中的铃素在发问：“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9]¹⁴²

在千疮百孔的现实与绚丽缤纷的梦想巨大的落差间，“五四”男女似乎都陷入了僵局，明明冲破了层层阻碍取得了“胜利”，如今却又不知被什么绊住找不到出口，只能疲惫无奈地向现实妥协。

在“五四”的大布景下，青年男女们的迷失事实上就是时代的迷失。破而未立且破大于立的时代中，“五四”青年们无法因为一场短促的思想革命就超越时代的局限，做到真正的改头换面，自然更不能克服外在的社会不足独自走向美满。子君、涓生、沁芝、罗、密斯范……他们都是“五四”洪流中最真实的存在。从旧到新的跨越和叛逆不能一蹴而就，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和青年男女们心灵渴求间的巨大断层也只能依靠时间去一点点弥合，终有一日，社会会发展成他们所期待的那样，那些“五四”宣扬者们曾预约给无数青年男女们的黄金时代也会真正的到来。就如鲁迅所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12]¹⁴⁷

总之，在“五四”破而未立的背景下，青年男女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完成个人的解放，新旧交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新思想的洗涤，还有旧思想的残留，不彻底的革命再加上落后的时代，“五四”儿女们的自由婚恋走向悲剧是必然的结局。

参 考 文 献

- [1] 朱文通.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 胡适. 论贞操问题[J]. 新青年,1919年第六卷第四号.
- [3] 茅盾.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J]. 小说月报,1921,12(8).
- [4] 陈望道. 恋爱 婚姻 女权 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5] 王伟华. 张爱玲全集:第四卷[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 [6] 黄雯. 论“五四”小说的婚恋观[D]. 西安:西北大学,2010.
-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 贾振勇. 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 鲁迅研究月刊,2011(3):23-27.
- [9] 肖凤. 庐隐:何处是归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0] 王桂妹. 重读“娜拉”的两个中国文本[J]. 文艺争鸣,2005(5):15-80.
- [11] 肖凤. 庐隐:胜利以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2] 鲁迅.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A New View on the Free Marriage Tragedy in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PENG P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of May 4th Movement, the young generation were suddenly awakened from the silence depression for long. They began to advocate the self-selecting marriage and the free love, for which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feudal ethics. However, after May 4th Movement emerged some novels about the stories that the lovers finally got married through the struggle but the marriage ended in tragedy.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re are conflicts of old and new ideas and mistakes related to the gender gap among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Besides, the tragic ending of free marriage is also doomed with the development lag of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free marriage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second thought; Chinese Nora; the “duration of spouse”

【编辑 吴晓利】